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失地农民问题  
——以上海市三林世博家园 B 区为例

“心随博动”调研团队

作品类别：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作者类别：集体项目

作者学历：本科生

所在学院：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专    业：社会学

作者年级：三年级

学    制：四年

## 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失地农民问题 ——以上海市三林世博家园 B 区为例

**【摘要】**大型工程建设频繁造成大量农村集体土地被占用，农民失去土地，被迫卷入城市化进程，成为失地农民。学术界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可归纳为失地农民规模、失地农民产生原因、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sup>①</sup>、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六个方面，且主要从经济、文化、环境角度阐述，从社会网络角度阐述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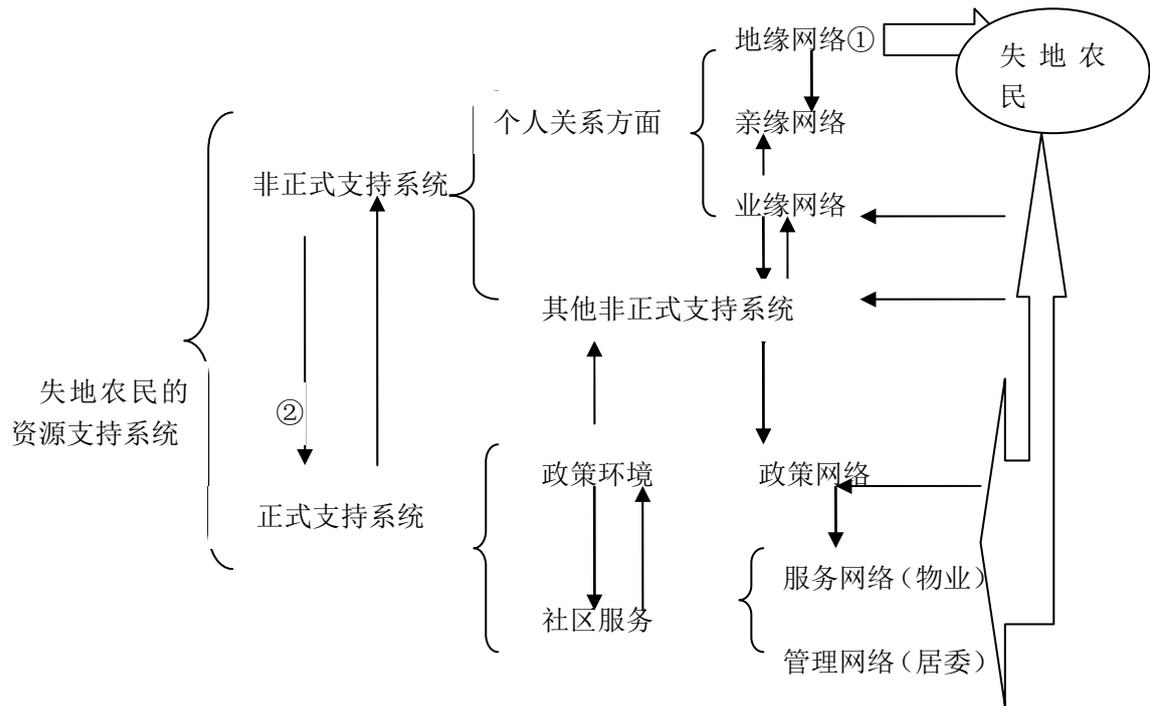
本文以团队 2010 年两次共一个多月对上海市三林世博家园 B 区失地农民的实地调查为依据，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失地农民问题，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式访谈及实地考察的方法，静态分析其社会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紧密程度等，动态分析影响因素和其运行机制，并基于政策环境和社区服务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部分消弭失地农民失去土地资源的损失，提高获取资源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失地农民 社会网络 因素分析

<sup>①</sup> 该问题又可细分为征地补偿问题和安置方式问题。

## 逻辑框架

本文中，失地农民的支持系统分为两类：定性分析来看，个人关系型社会网络属于非正式的支持系统，政策环境型网络和社区服务型网络属于正式的支持系统。



## 目 录

前 言 .....	6
第一章 理论准备 .....	7
1.1 国外社会网络研究 .....	7
1.2 国内社会网络研究 .....	7
1.3 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研究综述 .....	8
第二章 研究对象、地点选择及概念界定 .....	8
2.1 调查地点的选择 .....	8
2.2 抽样对象和方法 .....	8
2.4 概念界定 .....	10
第三章 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现状分析 .....	11
3.1 规模分析 .....	11
3.2 关系构成分析 .....	13
3.3 紧密度分析 .....	15
3.4 基本结论 .....	17
第四章 嵌入资本的社会网络因素分析 .....	18
4.1 客观性因素：教育因素、家庭收入因素、职业因素 .....	18
4.2 社交性因素：互动因素、结交场合 .....	19
4.3 主观性因素：交往意愿、交往障碍、交往观念 .....	20
4.4 其他因素：信息因素、社会归属感因素、制度因素 .....	23
第五章 思考和政策建议 .....	24
5.1 基于政策环境的思考 .....	24
5.2 基于社区服务的思考 .....	27

5.3 结语：走向以人为本的工程动迁.....	30
参考文献 .....	30

## 前 言

2011年西安世园会举办，让我们想起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同样体现了世园会的理念——更宜居的环境，更高质量的生活，人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即“以人为本”。然而，每项工程总是或多或少地伴随着动迁，能否处理好动迁居民即“人”的问题成为衡量一项工程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上海市在对动迁居民集中安置这一探索无疑是值得借鉴的，尤其是对于当地农民的集中安置。本文选取社会网络视角对其进行研究，试图更全面地反映出失地农民的现状、问题，同时为类似安置区提供参考性建议。

目前，国内从社会网络研究失地农民群体相对较少，尤其是实证研究，且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就业、养老、医疗）、利益补偿、土地流转三个方面，尚无统一范式，这些方面都可以纳入到社会网络的正式支持系统中来。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具有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社会网络研究的内容和理论。

本文在宏观上对B区失地农民新形成的社会网络进行描述，微观上对网络中的变量元素进行动态分析。社会网络具有双重性质（分别是“关系”资源和资源传输路径），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失地农民问题进行探析，宏观层次上，有利于为决策者运用好社会网络，优化设计，做出有利于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决策，更好更快地推进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中观层次上，为相类似社区的“新居民”融入社区创造条件提供；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农民自身积极开发潜在的网络资源，逐步减少甚至消弭失去土地资源的痛苦。

## 第一章 理论准备

### 1.1 国外社会网络研究

“社会网络”一词最早由布朗提出。50年代起，一些学者为了研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跨界关系，开始系统发展网络概念（S.E. Nadel, J. A. Barnes）。60、70年代社会网络观点在学术界影响迅速扩大；社会网络概念逐渐被学者接受并运用于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使社会网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学领域。社会网研究在规模上不断扩大，方法上也日趋成熟。初期社会网研究方法主要是用于小群体，后扩展到社区研究，现已应用到社会学的许多领域，如阶层研究、社会流动研究及社会工作等。

### 1.2 国内社会网络研究

国内对于社会网络的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对社会网络研究大致可从三个角度进行分类：一是纯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如边燕杰从个体层面提出过关于社会资本的构成、来源和作用的分析框架；张文宏在“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肖鸿，1999）、“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张文宏，2003）等。二是比较研究。有国内跨社区的研究，如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比较研究（蔡禾、叶保强、邝子文、卓惠兴，1997；张文宏、阮丹青，1999）；有跨文化比较研究，如天津与美国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阮丹青、周路、布劳、魏昂德，1990）等。三是专题研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以及不同的群体，包括青年类的（狄金华、钟涨宝，2004；方壮志，1995）；老年人类的（许传新等，2003；张友琴，2001；刘爱玉等，2000）；流动农民的（王毅杰、童星，2004；李培林，1999）；还有研究社会支持网与农转工人员的再边缘化的（张汝立，2003）。

### 1.3 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对于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研究未成系统，只是零散地见于若干文章之中，较为突出的有：彭良军（2007）<sup>②</sup>基于武汉市洪山区的调查队社会网络与失地农民职业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对完整的实证分析。刘晶晶（2006）<sup>③</sup>在《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的管理——以易县坡仓乡四个村饮用水的社区管理为例》中从微观的视角，以社区为层面对农村公共产品管理进行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描述和分析饮用水的社区管理制度的形成。沈关宝，李耀锋（2010）<sup>④</sup>在《网络中的蜕变：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探析》中依据实地调研资料，对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其市民化之间关系进行研究。

## 第二章 研究对象、地点选择及概念界定

### 2.1 调查地点的选择

三林世博家园是上海最大的世博会配套动迁小区，也是世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B区成功集中安置了当地农民，即失地农民，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综合调查主题、样本代表性、样本量特征最终选取。

### 2.2 抽样对象和方法

调查对象是世博会动迁中的本地农民，集中安置于94弄B区1—130号楼

<sup>②</sup> 彭良军，社会网络与失地农民职业地位获得——基于武汉市洪山区的调查，硕士毕业论文，2007年5月

<sup>③</sup> 刘晶晶，《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的管理——以易县坡仓乡四个村饮用水的社区管理为例》，2006年7月第8卷第4期，宁夏党校学报 Journal of Ningxia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 Jul., 2006. Vol.8 No.4

<sup>④</sup> 沈关宝，李耀锋，《网络中的蜕变：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

栋，楼栋号构成抽样框，鉴于样本总体数目相对比较小，且分布比较集中，我们采用了以“户”为抽样单位，一个楼栋随机抽取一户。调查得到 128 份调查问卷，有效回收 115 份，回收率 89.84%。失地农民总体基本情况如下：

### 1、年龄结构

年龄层	人数	所占百分比
0—19 周岁	约 150 人	5%
20—39 周岁	约 900 人	28%
40—60 周岁	约 1350 人	42%
60 周岁以上	约 800 人	25%
总计	约 3200 人	100%

### 2、文化结构

学历	所占百分比	人数（总体）
小学	26%	832
初中	27%	864
高中	24%	768
大中专	23%	736

### 3、月纯收入状况

2000 元以内	52%	1664
2000—2999 元	17%	544
3000—4999 元	14%	448
5000—10000 元	15%	480
10000 元以上	2%	64

## 2.4 概念界定

### 2.4.1 失地农民

原来在国家或集体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由于国家公共事业建设或商业开发需要而使其部分的或全部的失去了原本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导致身份、职业发生变化的人。

### 2.4.2 社会网络

本文社会网络指失地农民相互之间，与从世博园搬迁过来的居民之间，与基层政府之间等方面的关系体系。具多重属性：①决定行为的结构，②是一种输送渠道，③本身是一种资源，更具实践意义的功能在于资源分配。

### 2.4.3 社会网络规模

社会网络规模是测量一个人的社会资源拥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简单说是社会网的大小和范围。

### 2.4.3 社会网络关系构成

社会网成员间的具体关系，特别是社会网的核心人物（被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的具体关系。

### 2.4.3 社会网络紧密度

社会网络紧密度用以衡量社会网结构松紧程度或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程度。

### 第三章 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现状分析

在实地调查后，我们对所得资料进行了整理，并首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的现状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

#### 3.1 规模分析

因调查很难获得调查对象个人社会网中的所有成员的确切人数，本文采用一种变通方式，在某种特定情境中，与调查对象的联系、往来状况来考察。

##### 1. 亲缘网络

“当您遇到重大事件时，您认为能够提供给您帮助的亲人有几个？如有，请列举”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098	0	
会	1-2	0.293	0.4395	
网	3-8	0.437	2.4035	
规	>9	0.172	1.892	
模			4.735	115

可见，失地农民亲缘网络规模大致集中为 1—8 人。

##### 2. 地缘网络

“搬到此地后，您与以前邻居朋友来往状况是？”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043		
会	1-9	0.407		
网	10-25	0.399		
规	26 以上	0.251		
模			16.9465	115

## “动迁后，您结交了几个新朋友”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188		
会	1-9	0.257		
网	10-25	0.312		
规	26 以上	0.293		
模			15.847	115

以上数据表明，绝大部分失地农民保持和以前邻居联系，且新认识不少新朋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失地农民的地缘网络规模有所扩大，原因主要有：1、集中安置，小区人口密度相对过去高；2、失地农民大多有着共同经历，有共同话题；3、失地后闲暇时间增多，特别是老年人。但这里的“新朋友”很多仅限于随意的聊伴，具有流动性强、亲密程度低、时空限制高、同质性高等特征，因此他们主要发挥的是提供一种情感宣泄和信息传递（如，小道消息，谁家多分了几套房等）的渠道。

## 3.业缘网络

## “在目前这份工作上，认识了几位新朋友”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039		
会	1-9	0.211		
网	10-25	0.273		
规	26 以上	0.427		
模			18.9155	115

## “当您遇到困难时，有几位工作上的朋友可以帮助您？”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077		
会	1-9	0.472		
网	10-25	0.253		

规	26 以上	0.198		
模			10.2105	115

由于“0—19 周岁”和“60 周岁以上”这两个年龄层的人基本上没有无工作，填答者集中在“20—59 周岁”。由数据知，核心帮助业缘网络规模集中于 1—5 人，平均数为 14 人，而“40—59 周岁”年龄层的调查对象更倾向于选择 1—5 人，“20—39 周岁”年龄层更倾向于选择“6—15 人”和“26 人以上”，很明显，年轻人的业缘网络规模网络更大，更富有弹性，且充满了生机、活力。故对于失地农民业缘网络的建构，抓住“20—39”周岁这一年龄层群体，最易见成效。

### 3.2 关系构成分析

#### 1. 亲缘网络

失地农民现在的家庭类型主要以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为主。由于一户（动迁前的“户”）分得多套房，传统家庭被拆分开，老人被有理由的请出来单独住，子女顺理成章地分家。调查中最常见的家庭组合是：老两口或孤寡老人、青年夫妇和孩子、中年夫妇和离家念书的孩子。因此，此次世博动迁对失地农民的亲缘网络进行了一次大分割。

对于 60 周岁以上的相当一部分老人来说，在地理空间上从儿女的亲缘网络中割离出来，有被儿女遗弃的感觉。对于“20—39 周岁”年龄层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原先亲缘网络中最富生机的组成的部分，除去其它部分，减轻了负担。而对于“40—60 周岁”年龄层来说，情况比较特殊，孩子都接近婚龄，一旦孩子成家搬出去，就面临着成为空巢家庭。

## 2. 地缘网络

列 11	列 12	列 13	列 14	列 15	列 16
6#		7#		8#	
0	0	2	1	0	2
1	1	1	0	1	2
1	0	2	1	0	2
0	0	0	1	1	0
1	0	0	1	0	1
1	2	1	1	2	1
16#		17#		18#	
1	2	1	1	1	2
0	1	1	0	1	1
2	1	1	0	1	2
0	1	1	2	1	1
1	2	1	2	1	1
1	0	0	2	2	1

注：“1#”表示第一栋楼，“无”表示非居民居住，为店面，“1”和“2”表示失地农民居住，即我们的调查对象，“0”表示出租。表格横向（行）表示楼层，如，1#共6层，表格纵向（列）表示单元楼，如，1#有两个相对的单元。

罗家德曾做过有关 A 外商公司的调查，表明一栋楼的楼上楼下一般不太来往，尤其是情感性的网往来几乎都没有了。我们以上图的六个楼栋为例，一个楼栋有两个相对的单元，按照罗家德的结论，上下楼之间不太往来，那么一栋楼里最可能有较多互动的就是相对的这两户人家了。请注意表示出租符号的“0”，它们嵌入在各个楼栋里，尤其是 7#，12 户人家有 6 户是出租的，租客具有流动性、短暂性、封闭性等特征，他们租房子只是为了找一个栖息的地方，没有条件、没有心思也没有必要发展所谓的邻里关系，从实地调查中，我们也发现，相对的两户人家，如果一家是失地农民一家是租客，他们一般是互不知晓的，最多也只有点头之交，也就是说，房子的出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失地农民带来经济收入，但是租客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失地农民邻里关系的构建也起到了阻碍的作用，这样，他们的地缘网络迅速城市化。

### 3.业缘网络

业缘网络集中在“20—39周岁”“40—60周岁”这二个年龄层的人口中。调查表明，“20—39周岁”的大部分在世博动迁前就是从事非农职业，他们的业缘网络基本保持了原状，而且由于从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化，给予了他们某种身份上的荣誉感，一定程度还活跃和丰富了原来的业缘网络。

“40—60周岁”年龄层的情况就相对复杂多了，他们中的大约一半在动迁前只从事农业或从事农业兼非农职业，也就是说土地这一自然资源在家庭的收入中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业缘网络对他们来说并不十分明显，但是一旦失去土地后，这个网络建构的意义瞬间就凸显出来了。但是，在现实中这个年龄层的失地农民的业缘网络的建构是困难重重的，首先是他们的教育水平、自身技能的限制，其次，年龄的限制，尤其是女性，对于四、五十岁的失地妇女来说，基本上是被就业市场淘汰的，再次，身体条件的限制。基于这些劣势，这个年龄层男性再就业的主要是保安工作，女性主要是从事保姆工作这样低层次的岗位，因此，他们的业缘网络层次是相当低的，里面的关系构成不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个年龄层是失地农民业缘网络建构的木桶短板。

#### 3.3 紧密度分析

鉴于同样原因，很难确定网络成员数量，本文依旧采用另一种变通方式处理，即用社会网络核心成员与成员的交往频次来确定它们关系的紧密程度。

##### 1.亲缘网络

如上文提及，在住房结构变化推动下，失地农民的家庭类型主要以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为主。以核心家庭为例，其家庭内部的成员的紧密度是非常高的，即丈夫、妻子、孩子构成了最稳固的三角形状，妻子和丈夫身后各有一张亲缘

支持网络，紧密度逐渐降低。

## 2. 地缘网络

“您曾到过现在的邻居家串门聊天或者借东西吗？”

从不 0	偶尔 1	经常 2	愿意 3	看情况 4	不愿意 5
------	------	------	------	-------	-------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673		
会	1	0.287		
网	2	0.044		
紧	3	0.528		
密	4	0.376		
度	5	0.092	3.923	115

“如果现在的邻居家有了红白喜事，邀请您参与，您是否愿意？”

愿意 0	看情况 1	不愿意 2	
------	-------	-------	--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0	0.526		
会	1	0.382		
网	2	0.312		
紧	3	0.092		
密				
度			0.566	115

由统计数据，失地农民“从不到现在邻居家串门或借东西”选项率高达67.3%，可知，他们已经逐渐向着城里人“钻进小楼成一统”的生活方式过渡，但“现在的邻居有了红白喜事要求您参与，是否愿意”中选择“愿意”的选项率也达52.6%，“看情况”的也不占少数，可见，失地农民在心里有着较强的交往的意愿，但较被动。因此，就紧密度来说，失地农民的地缘网络紧密度是非常低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对于各个年龄层来说，新的地缘网络基本没有建构

成型。

### 3.业缘网络

“上个月您把多少位同事带回家里吃饭？”

变量名称	数值	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样本数
社	2 以下	0.681		
会	2-5	0.298		
网	6-10	0.019		
紧	11 以上	0.011		
密			1.7115	115
度				

在中国文化中，吃饭涵义丰富，把一名非亲属领回家吃饭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们的关系走得比较近了，很好地体现了紧密度。失地农民业缘网络在整体规模相对其它网络还是比较庞大的，但加上“紧密度”限制，就迅速缩减了。由数据可知，失地农民的业缘网络紧密度较高的规模集中在3人左右。

#### 3.4 基本结论

**结论一：**失地农民群体不同年龄层的社会网络具有不同特征。如上所述，对“0—19周岁”和“60周岁以上”<sup>⑤</sup>，其业缘网络基本处于缺失状态，亲缘网络和地缘网络往往会有很多交叉之处，如，由于年龄的限制，他们的活动半径一般离家较近，这样，住得近的亲属交往频率相对就高得多。因此，从农民层次内的网络关系分析得出，对于这两个年龄层来说，应该侧重于地缘网络的建构。对“20—39周岁”和“40—59周岁”，业缘网络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网络，它和地缘、亲缘都有交叉，且对另外两个网络有很强的决定作用，就是说，如

<sup>⑤</sup> 60 岁以上（老年人）：约 800 人，社会网络线条的断裂具有不可恢复性（尤其是亲缘和地缘，亲缘上，原先平房和子女住在一起，动迁后，大房子换得几套小房子，老人被孤立了出去；地缘上，外来人口的涉入，邻里重组，地理空间距离的变化等）；40—60 岁（中年人）：约 1350 人，上有老下有小，负担最重、职业上的冲击最大（由从事农业转为非农业），情况最复杂，问题也最多，因此该群体是动迁工作稳定的关键人群，是研究的重点。20—39 岁（年轻人）：约 900 人，成功市民化，享受较多城市化带来的好处。

果两个个体之间的在业缘上有连接，很可能会拉近亲缘和地缘网络的关系，但是如果在业缘网络上出了问题，其它两个网络就很可能遭到破坏。

**结论二：**从失地农民整体来看，其亲缘网络存在质量上的限制，通俗地说，就是失地农民家里有权有势的亲戚的还是占少数，另外，亲缘网络属于先天性的网络，具有客观性，不易改变；在地缘网络上，由于新的住房结构及租客的阻隔，其现阶段构建得也并不理想；在业缘网络上，对于“0—19周岁”和“60周岁以上”两个年龄层的人群来说，基本处于缺失状态，而对于“40—59周岁”年龄层来说，业缘网络建构困难重重。综合可得，对于大多数失地农民来说，很难通过自身层次的三个网络来实现特定的利益诉求。这样，正式的支持系统，例如政策网络、社区服务网络和管理网络的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 第四章 嵌入资本的社会网络因素分析

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在网络资本视角下对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进行了多因素分析。

### 4.1 客观性因素：教育因素、家庭收入因素、职业因素

#### 1) 教育因素

统计分析表明，“40~60周岁”和“60周岁以上”年龄层失地农民的整体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绝大多数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他们社会交往的层次较低，使得社会网的趋同性增强，异质性减弱。一般意义而言，人们倾向于与背景相近的人交往，而相近的教育程度使得失地农民之间更容易沟通，成为朋友的可能性相对要高。

#### 2) 家庭收入因素

农民失去土地之后，总感觉失去了依存的根本，即使原先从事的是非农职业，我们揣测这可能就是文化的因子在起作用，尤其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因为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有时不得不省吃简用，而事实上，他们的每套房子价值上百万，但“房子不能用来吃”，这说明房子的变现能力有限，只能靠租出去来获取收益。

### 3) 职业因素

统计结果表明，“40~60周岁”的失地农民绝大部分都已经脱离农业，完全从事农业的只有5%。但更多的是隐性失业，待业在家，一方面因为地处上海，外出打工的并不多，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和职业技能限制，该年龄层的就业主要集中在保姆、保安和家政，这样的职业状况，明显制约了失地农民与世博园搬迁过来的居民进行交往，限制了失地农民社会网的规模；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网的质量，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不利于融入社区。

## 4.2 社交性因素：互动因素、结交场合

### 1) 互动因素

从失地农民来往人数互动频次来看，亲缘网络方面，因为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家庭规模的缩小，动迁在互动频次方面影响并不显著。从互动方式来看，搬迁前后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电话与亲戚联系，冲击也相对较小，原因在于整体搬迁，集体安置。在地缘网络方面，动迁的影响较为显著，来往状况较之搬迁前明显减少，上文中提高交往障碍和地理空间的解释，此处不再赘述。从失地农民的核心帮助网来看，由于集中安置B区，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先的社会关系网。

另外，从年龄层来看，由于40~60周岁和60周岁以上人群总体收入水平低，

可用来进行交换的资源非常有限，使得他们的社会网相应萎缩，进而使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严重不足，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调查发现，一些人认为自己家庭条件不好，亲戚躲都来不及，更别说能给予什么帮助了，结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只能自己承担，例如个案研究中某女士提到“亲戚不使坏就好了，还谈什么帮助呢”。

## 2) 结交场合

失地农民交往主要通过熟人闲聊和朋友介绍认识的，业务往来和婚宴聚会也是很重要的渠道。也就是说，失地农民相互之间建立社会网络的渠道相对单一。交往渠道的窄小，导致他们交往的群体相对单一，进一步使得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趋同性增加，异质性减弱。相对而言，朋友介绍和熟人闲聊在 20~40 周岁人群中的比重远高于 40~60 周岁，而通过婚宴聚会认识的比重最高的是 20 周岁以下。

### 4.3 主观性因素：交往意愿、交往障碍、交往观念

#### 1) 交往意愿和交往障碍

调查发现，总体而言，三个年龄层交往意愿都较强，比较而言，“60 周岁及以上”年龄层交往意愿要低于其他人群，“40~60 周岁”年龄层的交往意愿最高。在“40~60 周岁”年龄层中，如果从世博园搬迁过来的居民有了红白喜事，邀请失地农民参与，81.5%的愿意，14.0%的看情况，4.5%的不愿意；而在被访的“60 周岁及以上”年龄层中，51.0%的愿意，45.0%的看情况，4.0%的不愿意。可见，失地农民对于红白喜事还是有很大的参与兴趣的，因为人情是村民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之一。而交往障碍最明显的因素在于“共同语言少”。

#### 2) 交往观念

一般而言，每个人在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社会网络时都会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在调查过程中选取了几个非常熟悉的几个观点来考证失地农民建立和完善社会网络的基本思想。

第一，地缘观念，对“远亲不如近邻”的回答，三个年龄层都基本类似，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都在80.5%以上，除去态度中立者，反对的不超过1.0%。可见工程动迁失地农民的地缘观念还是很强的，邻居在他们的社会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差序格局仍旧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加入了理性的因素。

第二，诚信观念，对“做人要讲诚信”这种观点，三个年龄层对此持肯定态度的居绝对多数，达到93.0%以上，这在几个选项中比重最高，可见诚信是他们社会交往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换言之，诚信对社会网的建立和完善非常重要。信任来自社会网络，信任嵌入社会网络之中，而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信任主要是通过私人关系来建立，以人际信任为核心，道德性的社会信任也往往建立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上，法制性的社会信任则很少。正因如此，工程动迁失地农民因自身抗风险能力不足，在经营活动中会尽量规避风险，将信任的对象绝大部分锁定在和自己具有共同特征的工程动迁失地农民身上，并通过社会网来获得自身的所需的资源，例如地缘网络是该群体很重要的信息来源。

第三，平等互利，三个年龄层对“为朋友两肋插刀”持赞成观点（包括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分别占19.6%（20—39周岁）、18.2%（40—60周岁）和25%（60周岁及以上），中立态度的分别为37.6%、31.3%和40%，反对（包括反对和强烈反对）的分别为41.8%、50.5%和35%。可见，为朋友两肋插刀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工程动迁失地农民的认同，说明该群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更愿意去计较成本和收益。而对“朋友多了好办事”，工程动迁失地农民多数对此表示

了肯定（包括非常同意和同意），分别为 88.9%（20—39 周岁）、84.3%（40—60 周岁）和 90%（60 周岁及以上），中立的分别为 9.6%、14.5%和 5%，反对（包括反对和强烈反对）的极少。由此可知，朋友作为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社会资源，因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为社会资本而一直受到工程动迁失地农民的重视。调查显示，给朋友帮忙，同意（包括非常同意和同意）收取报酬分别占 25.1%（20—39 周岁）、28.0%（40—60 周岁）和 20%（60 周岁及以上），中立态度的分别占 24.6%、31.0%和 30%，反对（包括反对和强烈反对）的分别 50.2%、41.0%和 50%，也有个别人回答说“看情况，要看帮助的程度”。

第四，相对剥夺感方面，世博动迁是政府主导型搬迁，是非自愿的，工程动迁失地农民认为自己对国家对世博作出了贡献和牺牲，所以应该得到较好的安置。但工程动迁失地农民对政府的上层系统并不存在抵触情绪，关键在于基层政府，例如他们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只是到地方后被弱化。另外，由于土地出让是由村领导和镇政府代表他们和房地产商谈判，他们怀疑基层组织领导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设租的行为。再者，由于前后搬迁补偿标准并不一致，他们的心理“不自觉”地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和不公平感，毕竟他们的参照对象都是临近的几个村子。村领导并不居住在 B 区，他们大多在更高档的社区购买了住房。这种失落感，从性质上来看是“相对剥夺”感，而这种“相对剥夺”感导致对政府产生一种不信任感，埋怨政府欺骗了他们。

总体而言，传统的“差序格局”在现代化的开放社区表现并不明显，经过七年的培育，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网络已经具有了居民社会网络的某些特征，差序格局和理性因素并存。他们社会交往的理性化倾向，导致工程动迁失地农民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构成进行了一番重组，紧密度也发生了变化。类似的人生经历、一致的经济利益、相近的年龄等，都正在构成该群体人际关系的主流。

当人际关系越来越理性化的时候，一旦没有经济的滋润，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只会越来越小。

#### 4.4 其他因素：信息因素、社会归属感因素、制度因素

##### 1) 信息因素

调查发现失地农民主要通过新闻节目和熟人告知了解政府政策的，该群体大部分人认为国家的政策仅仅得到部分落实，大部分人对目前生活满意（包括很满意和比较满意）。深入了解后，笔者发现，该群体的信息获取渠道十分狭窄，获取到的信息层次低、内容少、相互矛盾并且鱼龙混杂。更进一步的，在工程动迁失地农民与政府的互动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大部分人是知道国家有优惠政策，但如上所述大部分信息是通过非政府渠道甚至邻里闲聊、小道消息等获取的。

上述结果暗示了两者的交往频率非常低，失地农民和三林镇政府缺乏沟通，而这种网络的相互联系非常微弱，导致信息的极度不对称。斯蒂格利茨认为公共信息的获取成本是公众支付，其产权及收益也应该天生归属公众，而不是政府或政府官员。如果公共信息的产权归属公众，那么公众产权的代理人——官员，任何时候对公共信息的屏蔽、窃取、扭曲都是对公共产权的一种侵犯，是腐败行为的一种，即“信息腐败”。

一般说来，为对付代理人的“信息窃取”和“信息扭曲”，委托人有两个可供选择的防范机制：一是退出机制，即用脚投票；二是言论机制。而官员敢于隐瞒信息，是因为公共信息市场不存在竞争，“退出机制”不起作用。调查发现，政府过于垄断信息，使得工程动迁失地农民对自己的搬迁费用使用状况不甚明了，比如搬迁费用的标准。再者社会资本具有资本的特性，即能够产生

利益 并影响经济绩效与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总之，信息的公开化、制度化对重塑失地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可谓意义重大。

## 2) 社会归属感因素

失地农民心理归属感主要体现在：是否认同自身的户籍制度上已经变化的居民身份，以及能否将自己看成社区的一员。调查结果显示，三个年龄层上 82.5% 以上都认同自己的居民身份，但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自己享受到了市民所有的权利，对“社区居民”的身份表达也都非常含糊。这表现在对物业的不满，例如国家当时承诺的低成本（物业费 6.5 元/m<sup>2</sup>）并未兑现。

## 3) 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主要体现在失地农民户籍的变化上——由农村户口变成了城镇户口。就 20~40 周岁的年龄层而言，这种变化是有利的，以往在就业时可能因为农民身份受歧视，现在则完全消除了。对 40~60 周岁的失地农民而言，问卷中有“是否享受到户口变化带来的好处”，69% 的人群选择了“一点点”，这部分人群中 40 周岁以上的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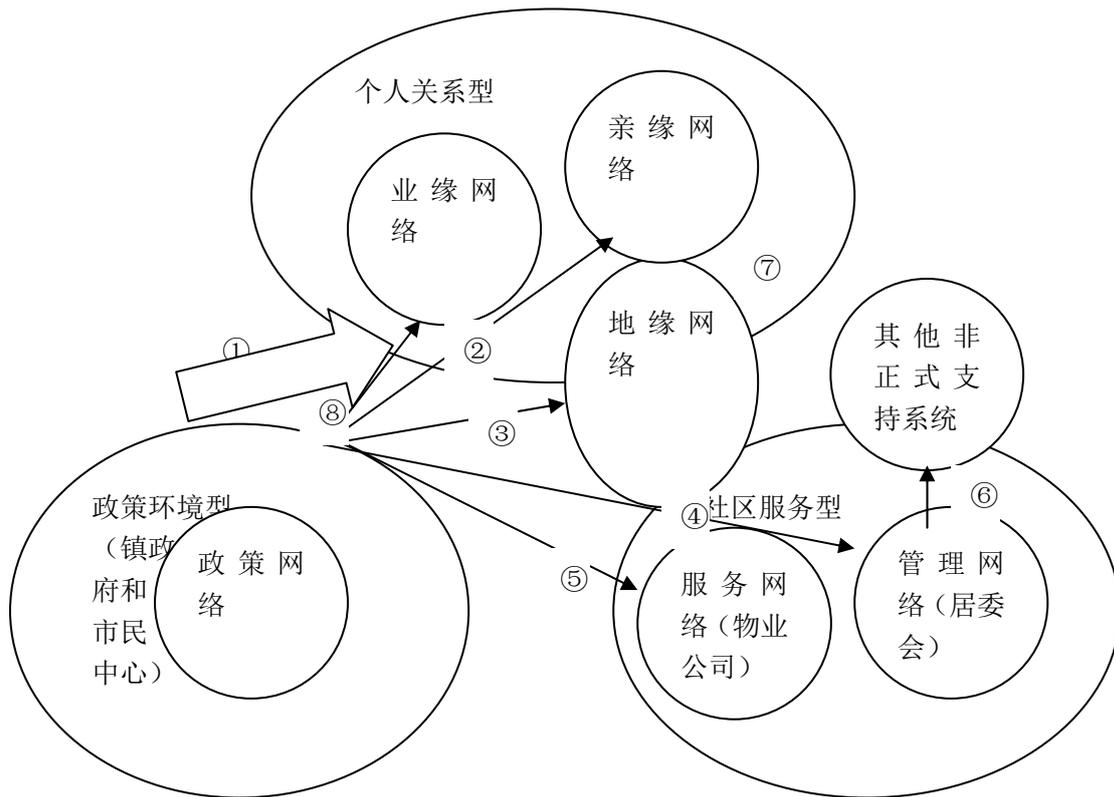
# 第五章 思考和政策建议

上一章对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本章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以期能为现有动迁政策提供建议。

## 5.1 基于政策环境的思考

政策环境方面，必须综合利用各种政策工具，重塑失地农民对基层政府和居民的信任，最终形成下图所表示的网络。

### 图一 基于政策环境的模式



第一，大型工程项目建设进行事先评估时纳入社会影响评估，同时加强政策评估。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这些方面的信息，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社会资源重要分配途径的公共政策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与此相联系，政策评估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

第二，分群体、分年龄层采取不同对策。如本文对不同年龄层的社会网络现状特点进行了分析，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可根据不同年龄层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对策。

第三，基层政府必须利用自己手上的舆论工具，对失地农民进行正确的引导，适当降低他们对基层政府的期望值（图一中线①）。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失地农民对镇政府非常排斥，评价也非常低，怀疑镇政府领导存在贪腐问题，并且大多数人认为国家的政策是好的，他们应该从大局考虑，自力更生，不能

过分依赖国家和政府，只是政府应定期对他们拆迁后的生产、生活进行调查了解，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后续发展问题。当然，也有部分失地农民仍存在对国家的依赖心理和等、靠、要思想，认为他们为了世博会做出了贡献，应该享受较好的待遇，基层政府应该给予特殊照顾，如果他们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要采取上访的形式来挽回他们的损失。

第四，对于失地农民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如社会保障方面的养老问题、医疗保险问题和基础设施问题，基层政府应该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方案来，这也是基层政府能够获取失地农民社会信任的第一步（图一中线②）。笔者曾到三林镇人民政府（社会保障部）和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了解针对失地农民群体的具体政策和方案，但并未看到相关的政策方案，可以确定这一方面的政策网络缺失。调查发现，失地农民普遍认为镇政府过多侵占了自身的利益，一是老家安置补偿折价较低。二是村委会领导存在寻租可能。三是失地农民普遍反映的医疗保险问题，存在小城镇和大城镇的不公。

第五，基层政府应积极为失地农民之间以及失地农民和世博园搬迁过来的居民之间创造交流的平台，拓展他们的地缘网络（图一中线③）。如果没有适当的交往，失地农民之间的交流也就无从谈起。作为第一步，基层政府应该从现有的小社区为试点，逐步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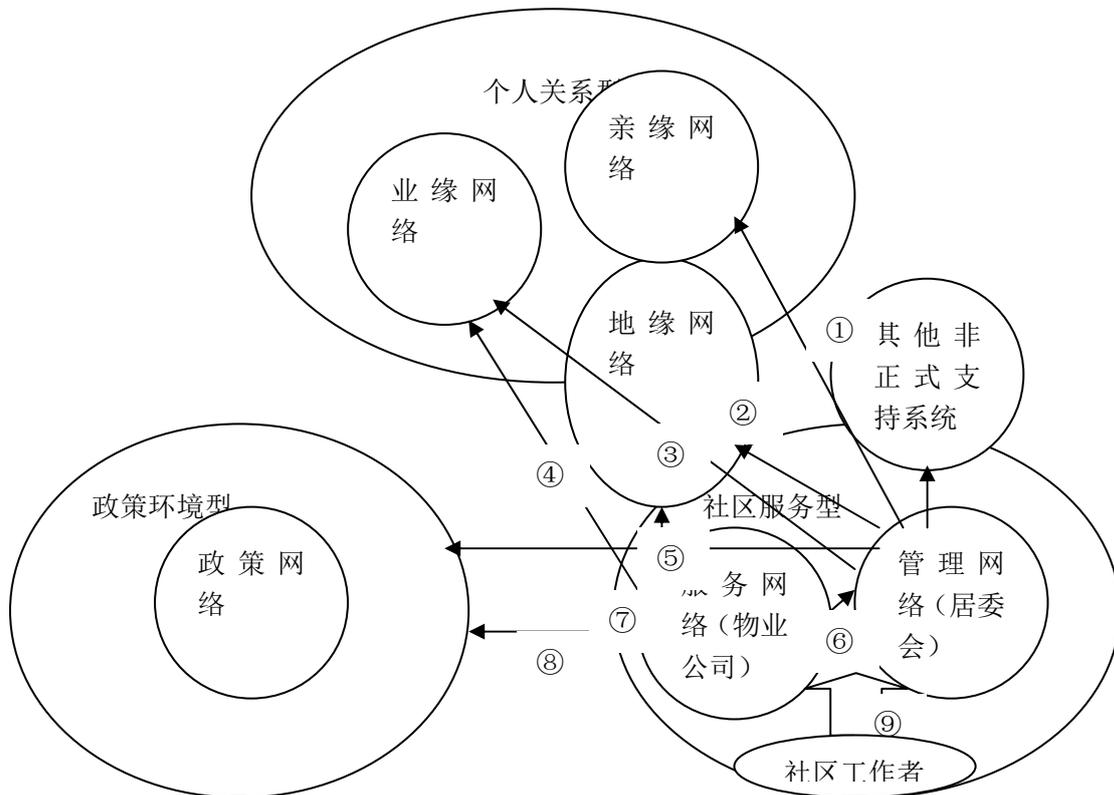
第六，镇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不断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把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给失地农民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才是治本之道。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失地农民就不可能有太多的资源来经营自己的社会关系网，那么他们的社会关系网也就不可能有质的飞跃。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三林镇镇政府设立了职业介绍所，这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失地农民的业缘网络（图一中线④）。同时，基层政府可以作为失地农民的代言人和物业公司进行协调，解决

两者的不和谐问题，为构建和谐温暖的服务网络尽责（图一中线⑤）。当然，更重要的在于指导居委会的各项工作，这一点同时也是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的职能（图一中线④）。

### 5.2 基于社区服务的思考

社区服务方面，要充分发挥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职能，坚持以人为本，密切关注失地农民自身需求，最终形成图二所示网络。

图二 基于社区服务的模式



第一，扩大社区场所参与。王亮在《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归属感》中提到社区作为居住在一定地域上的特定的群体所组成的共同体，难免带有相对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类似于俱乐部产品。因此，社区内的资源是社区提供社会支持

的重要来源。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分析了良好的社区场所的建设对社区居民场所参与，进而对社区活动和组织参与的影响。说明社区较好的物质建设条件能够为密切社区网络施加影响。

第二，扩大社区活动参与。1、定期开展形式多样、有特色的社区娱乐活动与睦邻活动；2、在文体活动参与动员与管理体系统建立的基础上建立社区相关志愿活动、或是居民自治活动。社会网络是需要通过交换来维系的，人们在交换中实现互惠，而这种互惠又进一步强化了交换和信任的关系。要在居住地和当地居民建立起新的地缘关系，必须通过互惠的交换的社区活动才能得以进行。交换即意味着双方处于相对对等的位置并占有对方需要却不拥有的资源。韦尔曼认为，个人往往采取以下三种形式报答别人提供的帮助：①精确的交换，即别人提供什么帮助就给予什么样的报答；②泛化的互惠，接受别人帮助的人报答以其他形式的帮助；③网络平均，接受别人帮助的人不直接给予别人报答，而是通过 会干部，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本来不是小区的人还老是给他帮助另一个网络成员间接起到互惠的效果。

第三，扩大社区组织参与。帮助失地农民建立失地农民自助团体。托克维尔模式(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正式组成的自发性组织中面对面的合作对于在公民之间产生民主规范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组织传授给他们信任、节制、妥协和互惠的公民美德以及民主的讨论与组织技能。方竹兰认为，根据中国体制改革现阶段的特点，中国社会资本的积累首先应从构建社会资本的自组织系统做起。陈健民等运用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分析社团的作用，采用“市民社区”的视角，把社团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认为社团的发展有助于建立人际间的沟通与合作，缔造互信和互惠交换的规范，从而减少在公共事务和市场上的“搭便车”或利益互损行为。最终对社区和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做出贡献。

第四，社会关系方面：1、居委会在优化自身传统职能例如调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纠纷；2、开展针对性的社区教育。社区教育是带有自身社区特点的社会教育，其出发点和归宿在于消除社区的社会问题，为特定的社区及其成员的发展服务。在失地农民社区融入的过程中，社区教育比其他教育形式更具有优势，能针对失地农民的特点，为他们创设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此外，在社区规范方面：

第一，健全社区制度。1、建立社区工作者介入制度，为失地农民提供专业服务（图二中线⑨）。社会工作者通过指导案主充分利用系统拥有的资源，认识自身的潜能和优势，掌握与人沟通的能力和技巧；2、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制度歧视。狭义的制度就是指正式制度，它们以某种明确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由行为人所在的组织进行监督和用强制力保证实施，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在现代社会里外在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作为各种利益的协调搭建一个有效的框架，并对违反规则的行为提供强制约束机制，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并实现社会的公平。

第二，增强社区关怀。完善针对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无生活来源的“三无”人员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劳动保障，为弱势群体提供暂时补助、工作信息渠道与就业指导与培训，例如女性、40-60周岁的失地农民等。

第三，增加社区价值和社区认同。通过网络建设与制度推广，强化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令其认同社区居民自治、倡导的自主管理农村事务的精神，以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价值观。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公民参与能够巩固国家制度，有效的国家制度创造是公民参与更有可能兴旺的环境。意大利的经验表明，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政治实践。改革给地区政治生活带来了看得见的、大部分是有益的影响，这些变化趋势也出现在南方，一

点也不亚于北方。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改革都转变了旧的权力模式,创造了意大利统一后从未有过的真正的地区自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要更加注重增强失地农民对居委会、社区团体和社区居民的信任。通过社区制度的建立与社区规范的形成、社区参与网络的形成,使居民最终建立起对社区居委会、社区团体与居民的普遍信任。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因素。在一个重复博弈的稳定群体里,大家经过“利己”与“利他”的博弈过程达到互利的统一,形成了对共同规范的内在信任和对互惠利他行为的稳定预期。建立信任关系在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中是尤其重要的。城市社区建设如果不能合理解决居民之间的信任危机。那么社会成员的疏离感就会进一步加深,社区行动效率也会降低。社区信任能促进社区自治组织结构的建构,为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创造便利。福山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在群体和组织中,人们为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合作的能力。”而社会资本这种群体合作能力的基本前提是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

### 5.3 结语: 走向以人为本的工程动迁

事实上,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建构是否存在理性模式以及如何构建,还有待研究,我们上面的讨论也只提供了参考性的建议。总之,只有把农民自身的智慧和国家与社会的支持结合起来,以人为本,中国的失地农民群体才能走得更好更远,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也才能更加平坦。

### 参考文献:

[1] 彭良军, 社会网络与失地农民职业地位获得——基于武汉市洪山区的调查,

硕士毕业论文, 2007年5月

[2] 刘晶晶,《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的管理——以易县坡仓乡四个村饮用水的社区管理为例》, 2006年7月第8卷第4期, 宁夏党校学报Journal of Ningxia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 Jul., 2006. Vol.8 No.4

[3] 沈关宝, 李耀锋,《网络中的蜕变: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探析》,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

[4] 边燕杰:《社会网络十讲》[M],第三讲定名法,2006, <http://www.sociologyol.org>

[5] 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6] 王亮:社区资本与社区归属感的形成, 求索, 2006

[7] [英]约翰·密尔著.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9.

[8] 吴帅琴:《三峡农村外迁移民文化适应研究》[M],2007,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9] 风笑天,王小璐:《我国三峡移民研究的现状与趋势》[J]载于《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0] 沈小红、冯兰:《失地农民社会支持网研究》,[M]2007,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1] 施国庆、陈阿江:《工程动迁失地农民中的社会学问题》[J],载于《江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3月第1卷第1期

[12] 施国庆、陈阿江:《工程动迁失地农民中的社会学问题》[J],载于《江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3月第1卷第1期

[13] 张文宏: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M],2008,

<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xstl/xstl43/P020080324527614686630.pdf>

- [14] 李林艳:《社会空间的另一种想象--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野》[J],载于《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64页
- [15] 詹姆斯·科尔曼:1999,《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